

节事活动规划与城市转型^①

Festival & Special Event Planning and City Transformation

吴必虎 舒华

【摘要】中国城市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由传统的能源、工矿业、制造业、商业城市逐步转向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功能城市，在此过程中必须寻找新的、多元化的城市化动力。节事活动作为一类城市经济活动、城市旅游吸引物、市民文化生活形式，是城市发展的活跃、有效的动力，在促进工业型城市向人居型、现代服务业、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城市规划在城市定位、空间结构、土地利用、交通导引、城市管理等领域，对城市节事活动一直重视不够，相应的规划响应也就多有欠缺。本文针对这一情况，对中国城市转型中城市规划与节事活动规划之间的关系和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城市规划 节事活动规划 城市转型

Abstract: Chinese cities are now in a key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which translated these traditional energy cities, industrial & mining cities, manufacturing cities, commercial cities to multifunctional cities which dominated by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New diversity urbanization power should be found. As a kind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ourism attractions, citizen culture and lifestyle, Festival & Special Event (FSE) is the most active and effective power in urban development, F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promote these Industrial Cities

translated to Human Settlements Cities,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ities, and Tourist Destination Citie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ields of city orientation, spatial structure, land use, traffic planning and urban management, urban planning usually pays little attention and response to FSE. Coping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lanning and FSE, expounds related problems of them.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planning for festival & special event, city transformation

1 引言

节事活动 (Festival & Special Event, FSE) 是一个首先由西方学者提出的组合式概念，即节日 (festival) 和特殊事件 (special event) 的统称^[1]。具体来说，节事是以某一地区的地方特性、文脉和发展战略为基础举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或事件，形式包括节日、庆典、展览会、交易会、博览会、会议，以及各种文化、体育等具有特色的活动^[2]。近年来，由于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园博会等一系列重大城市节事活动在中国各大城市的频繁举办，中国的节事活动及其相关研究空前繁荣。在讨论和研究城市节事活动相关问题时，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经常还会使用到“重大活动”、“城市事件”、“特殊事件”、“节庆”、“会展”等概念。总体来说，这些概念互有重复，含义及覆盖面略有不同，城市规划学者经常讨论的“重大活动”可以视为城市节事活动的一种。值得强调的是，本文作者理解的“节事活动”并不仅仅包括级别高、名声大、影响范围广的诸如奥运会、世博会之类的国际性节事活动，同时也包括所有对一座城市或城市区域的发展产生某些影响的普通节事活动。目前

作者：吴必虎，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舒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① 本文照片皆由吴必虎拍摄。

学界关注的多是第一类节事活动，对第二类节事活动的讨论和研究较少。

节事活动作为一种短时间内积聚、协调各种城市资源和力量的手段，已经被视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性工具，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是实现城市复兴以及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知名度，实现城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契机。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建设空前繁荣，城市竞争空前激烈，与经济发展转型相呼应，中国的城市化也处在了重要的转型时期。21世纪的城市竞争，物质资源的竞争退居次要地位，文化、科技、人才等无形资源的竞争上升到主导地位。中国城市要想在国际城市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在学习、重走欧美主导的工业城市化道路之外，尚需探索具有东方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途径。要实现从工业型城市到人居型城市的转型，节事活动是一个重要契机（图1~图3）。节事活动能否成为城市发展转型时期的推动力？它能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规划和引导一系列的节事

活动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城市规划对此如何响应？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一系列问题。

2 城市转型：从生产型城市到人居型城市

2.1 重新审视工业化主导下的城市化

18世纪中叶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常常被视为世界城市化的开端，“从此世界从农业社会开始迈入工业社会，从乡村化时代开始进入城镇化时代”^[3]。从一开始，城市化就被打上了强烈的工业化烙印，城市开始以追求生产和资本的积累而存在。一大批工业城市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崛起，资源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城市集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严重、城市无序蔓延、居住环境恶劣、基础设施短缺等城市问题也伴随着工业城市化而来；人们对工业城市的极度不满，催生了一系列的城市改造运动，作为人居环境的城



图1 2008北京奥运会为城市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图2 北京奥运会的火炬点燃了北京人对未来的激情



图3 2010上海世博会大大改善了园区附近区域的交通设施与服务



市重新受到重视。然而，工业城市化的模式已经被奉为城市化的经典模式，不断地被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学习西方搞工业、走城市化道路成为 20 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主旋律。发达国家犯过的错误仍旧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上演，在工业化的挟持下，城市沦为简单的生产工具，城市居民为消费所绑架，追逐资本和利益成为城市的主要目标，城市的居住、交通、游憩功能仅仅作为生产功能的附庸而存在。

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到：工业型城市化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食物增产、人口健康、生活便利、国际交流等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工业化、特别是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由于历史背景、权力结构、全球市场和政治地图的巨大变化，那种资源掠夺、劳动力迁移、市场占有率和金融控制的条件已经不可能再度重现，欧美人的人均高消费资源环境的水平也不可能在全球普遍维持，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城市化途径，就很难模仿或重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与欧美国家经历过的工业化道路相比，中国只能在更为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4]。传统的工业主导的单一城市化模式难以为继，寻找新的城市化动力，推动多元的城市化模式，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2.2 世界城市转型：人居城市与旅游目的地城市

城市转型就是城市发展进程及发展方向的重大变化、重大转折，就是城市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大变革^[5]。城市转型往往伴随着各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展开，全球范围内，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芝加哥、新加坡等城市都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经历过城市转型的历程。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城市转型的目标往

往不尽相同，总的趋势是城市朝着关注人的需求的人本主义方向发展。21 世纪的城市转型是在环境危机、能源枯竭、人口爆炸、经济危机、全球化、信息化飞速发展等背景下进行的。生态城市、智慧城市、文化城市、集约城市成为当今城市转型的基本趋势^[6]。“创建”、“打造”、“新建”这几类城市的口号也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被喊出，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作为搭台的工具，真正唱戏的还是 GDP。多元的目标决定了转型驱动力的多元化，面对新的目标，曾经占垄断地位的工业化显得力不从心，高新技术、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旅游业、行政力量等成为新的城市转型驱动力。

城市节事活动作为转型的驱动力之一，在传统工业城市向文化创意城市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885 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之于伦敦，1983 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之于慕尼黑，1992 年的奥运会之于巴塞罗那（图 4），1997 年开馆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之于毕尔巴鄂……层出不穷的实例证明着：只要擅于利用，节事活动完全可以成为城市成功转型的主导驱动力。

综合上述城市转型趋势，不难发现，当今世界的著名城市，尤其是工业化结束的后现代城市都在向着人居型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城市两大方向发展。

根据吴良镛院士的阐释^[7]，“人居环境”首先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类建设人居环境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聚居”的需要。“人居型城市”就是把发展最佳人居环境，改善人类居住区的社会、经济、环境质量作为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城市作为人类高度聚集的地理空间，其存在的基本目的就是为居住在其中的人类提供优良的居住环境，这些基本常识在工业化泛滥的城市中曾被完全淹没。如今大多数城市仍然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城市化被视为目的本身，忘记了发展城市的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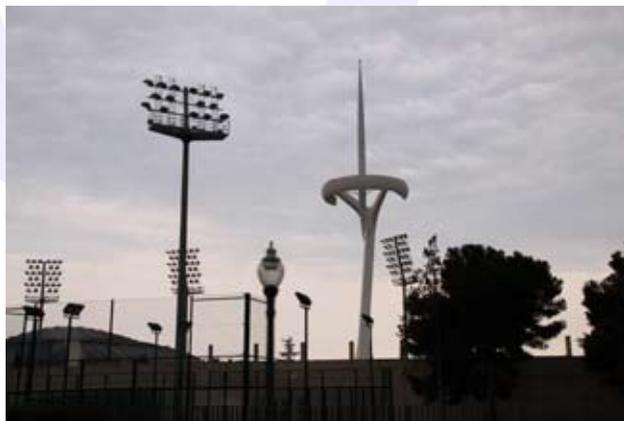


图 4 1992 巴塞罗那奥运会会址已经成为城市最受欢迎的旅游区之一

终目的是实现城市中的人的全面发展。当代城市面对来自资源、环境、人口的压力，要实现从生产型城市到人居型城市的转变，实非易事，对于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任何以发展为名义、牺牲大多数人以及后世子孙利益为特征的城市发展道路，已经到了需要断然喝止的时候了。城市之所以比乡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除了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优良的居住环境外，最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文化的聚集地。诚如芒福德所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丰富的城市文化构成了城市最根本的吸引力。

作为“旅游目的地型城市”，是指城市不仅仅是旅游客源产生地，更重要的是应该将其建设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休闲度假目的地。那些成功向旅游目的地转型的城市，无一不是本身就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它们曾经的衰落是片面追求工业化、盲目强调经济发展的结果，如今的复兴则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发现和发展的基础上的。只有城市本身发展好了，才能吸引外来游客，游客的到来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发展旅游目的地城市，一定不要忘记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吸引游客不是最终目的，城市的发展，当地居民的发展才是最终目的。

总之，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综合各类产业发展，向人居型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城市转型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世界城市发展一个潮流。

2.3 中国的城市化及城市转型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惊人成就。城市化率由 1978 年的 17.3% 上升到 2010 年的 49.68%（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城市人很快就将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中期”阶段；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沿海四个巨型城市密集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逐年提高；城市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变化是以许多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利益牺牲为条件的，他们的牺牲奉献成就了今天的繁荣。我们不难发现，牺牲农村促进城市、牺牲个人壮大国家是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然而，以数字增长为目的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盲目追求速度、重量轻质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冲突等众多问题已经无法回避。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城市化持续推进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居民生活方式已经进入转型时期，我国快速城市化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问题和政策困境，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国的城市化必须

转型，从注重量的增长到注重质的发展，从注重经济数字的增长到以关注人的发展为核心。

3 节事活动：作为城市转型的一个动力

3.1 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来自工业化的拉力和来自乡村的推力被视为城市化主要的驱动力，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化的驱动力开始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撰文指出了这一点。顾朝林在回顾了城市化的国际研究后指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化在最近 40 年其动力机制都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世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快速增长两个过程交叉相关^[8]。仇保兴针对中国的城市化指出，在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虽然仍然来自于工业化，但也伴随着机动化和全球化，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紧凑度和多样性理念息息相关^[9]。宁越敏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 1990 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10]。陈明星、陆大道等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研究发现，1981~2006 年间，中国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11]。

中国自然地理上的三大阶梯、南北环境上的纬度分带、多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这种种不同的资源环境与社会文化不同，造成了中国城市的千差万别，城市发展不平衡显著，这样的现实条件更加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搞“一刀切”，需要培育和发展多种动力。

3.2 节事活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常态情况下，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的、缓慢的过程，节事活动是一种非常态，大型的节事活动能在短时间内积聚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关注度，对于城市而言，是一股强大的新鲜动力，这股动力可以突破城市发展的惰性和惯性，对城市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未来发展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成为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的契机

承办奥运会、世博会这类世界性盛大节事，需要兴建专门的园区以及大量的场馆设施。这些园区需要一定的用地规模，在活动举行期间，会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城市

磁体，带动周边、甚至整个城市的发展。因此，历届承办城市都会在选址上大下功夫，使其与城市总体发展目标相结合。以世博会为例：在法国巴黎先后举办的5次世博会就对城区向西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则全面改善了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推动安达卢西亚区域和塞维利亚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使世博会计划成为外围新城市中心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些城市利用重大节事活动的选址机会，改造城市的衰败区、工业区、废弃区，例如1939~1940年纽约世博会展区利用城市边缘的垃圾场整治而成，经过1964~1965年第二次举办世博会后，逐渐成为风景宜人的城市公园^[12]；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选址在黄浦江两岸，将两岸的工厂用地腾出，借机还珍贵的城市滨水空间于当地市民（图5、图6）。



图5 城市节庆活动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市长们的关注：2003年中国市长协会在贵州铜仁召开中国城市节庆研讨会



图6 2010年中华文化促进会在西安召开七节论坛

（2）促进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节事活动的举办需要建设和完善与其相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成为节事之后，留给举办城市最大的物质遗产，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公路、铁路、地铁、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以及城市通讯系统、能源动力系统、防灾避灾系统、环保设施、住房储备，教、科、文、卫机构和

设施等。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更成为吸引外来游客、外来资本、人才的重要因素。以北京为例，为筹办2008年奥运会，七年间北京的城市总体建设投资，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城市环境建设，高达2800亿人民币。在交通方面的改善包括北京市道路承载能力和通行力的提升，以及新建的机场航站楼、四通八达的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系统等。在城市环境方面，北京奥运会实施了358个“绿色奥运”项目，包括69项新能源项目、168项建筑节能项目以及121项水资源项目^[13]。以奥运为契机，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大提升，因奥运而改造兴建的文化、教育、娱乐设施成为北京新的文化器官，为北京成为国际化的世界都市打下良好基础。

（3）树立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

节事活动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为城市争取到了更多的出镜率，城市借助节事活动，通过媒体宣传自己，成为城市目的地营销的重要手段。当今的城市宣传，就像娱乐圈的明星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一两次演出并不是主要目的，通过这些演出带来的持久的知名度才是最终目的。城市通过节事活动，将自己新的形象传播出去，提升知名度，能够吸引更多的到访者和外来投资商的进入。“城市们”总是在不断策划着、制造着一个个大的、更大的事件，因为市长们也认识到了用几个吸引眼球的房子打造了几张名片还不够，还要制造事件，制造把名片发出去的机会^[14]。一些城市就是因为它承办的节事而为世人所知的，它们的名字永远和那些著名节事联系在一起：就像戛纳电影节之于法国戛纳；博鳌亚洲论坛之于海南博鳌；达沃斯经济论坛之于瑞士达沃斯。

（4）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围绕大型节事的投资与运营无疑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不仅包括那些与节事组织本身有关的就业岗位（如当举办事件需要建设大量基础设施时，在建筑业内创造的就业岗位），还包括因大量游客的增加而在旅游业、零售业等服务行业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亚特兰大从1990年成功申办奥运会开始到1996年春，在与奥运相关的项目上总共投入了20亿美元，其结果是1991~1997年该区域共创造了58000多个新的就业岗位^[15]。与节事活动有关的就业岗位，多是来自服务行业的，这些就业岗位的增加响应了现代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即由工业主导逐渐转向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节事活动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能来自节事本身及其相关行业，也能来自节事后的旅游及外来投资。但要强调的是：节事活动也可能给城市经济带来重大负担，巨额的城市建设投资以及节事后场馆的维护费用，常常给一些举办城市带来

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债务危机，使得城市的经济一蹶不振，2000年的雅典奥运会就是一例。合理规划，做好财政预算，避免攀比，集约化地建设经营节事，才能够使其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器，而不是制动闸。

(5) 影响城市文化，提升市民意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城市，传统节事都是其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那么根植于城市文化中的节事活动，就是这个容器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现代的城市节事活动，不少是外来的，看似与城市的历史文化无关，但在其发展和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必然要融入当地文化；同时节事强烈的对外开放性，使得主办城市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带来当地文化的自我发现，促使其在对外交流中挖掘自身文化的独特性，通过举办大型赛事，主办城市将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所取得的卓越文化成就展示在世人面前；通过游人的耳濡目染和新闻媒体的连篇报导宣传，主办地的城市文化得以迅速向外扩展，为世人所知。

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传统节事，还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现代节事活动，市民的参与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否则节事活动只会沦为空洞的政府行为与商业作秀。市民参与到节事活动中来，有利于市民意识、社区自豪感、地方认同感的提升。中国城市转型关键的基础就在于公民社会的培育，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节事活动中的市民参与应当成为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3.3 国内外城市节事推动发展案例分析

国内外有不少利用节事活动实现城市成功转型的例子，值得借鉴。下述几例可以略加分析，其对中国城市节事规划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3.3.1 节事推动下的城市转型：慕尼黑

慕尼黑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德国第三大城市，位于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伊萨尔河畔，与奥地利、意大利交界。今天的慕尼黑，是德国主要的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重要的会展和旅游目的地城市，也是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这座在12世纪形成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优良的城市规划传统，二战之后，慕尼黑70%旧城遭到严重破坏，它的规划师们按照战前形式修复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建筑，在旧城内设计、新建城市开放空间，保留了慕尼黑的城市格局和古城风貌。1960年代，慕尼黑的城市经济进入迅猛发展时期，旧城保护面临商业经济的强烈挑战^[16]。城市化的加速，居民住宅缺乏，工业和商业用地的强烈需求，使得大量的传统建筑被拆，城市环境恶化，失业率增加，各种矛盾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作出了慕尼黑申办第2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重大决定，为了筹办1972年的奥运会，慕尼黑的城市建设开始由以经济发展为导向转向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为目标。当时的奥运会场选在了距市中心4km的奥伯维森区，一处占地约300公顷的废弃机场上，通过举办奥运会，加速了城市北部地区高效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17]，成功地带动城市北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以及新城的建设，缓解了之前的城市空间矛盾，成功开启了慕尼黑的城市转型之路：开始由工业导向的城市转向高新服务业、商业会展、旅游目的地城市发展。随后，慕尼黑又先后承办了三次重大节事活动，带动了城市规划的发展实施：1983年的国际园林展带动了旧城西部地区废弃地更新和开放空间的改善；2005年的联邦园林展促进了东部旧机场区Riem新城开放空间体系的完善和新区形象的提升；2006年的世界杯主赛场引导了北部城市外围边缘地区的良性发展^[17]。

这一系列节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改善举办城市的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些节事活动影响了城市产业结构、繁荣了城市文化、确立了城市的发展方向。如今的慕尼黑，每年要举行20多场会展博览，十月的慕尼黑啤酒节更是吸引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3.3.2 毕尔巴鄂与古根海姆

毕尔巴鄂位于西班牙北部大西洋海岸，是巴斯克邦（Basque）比斯开（Biscay）地区首府，城市坐落在山谷地带和纳文河（Nervion River）的河口，城市沿河线性展开，是西班牙最大的港口城市。毕尔巴鄂市始建于1300年，因优良的港口而逐渐兴盛，造船业发达，在西班牙称雄海上的年代曾是其重要的海港城市。由于铁矿资源丰富，19世纪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毕尔巴鄂发展成为西班牙北部重要的钢铁与船业运输城市，其钢铁工业甚至可与匹兹堡媲美。这一期间，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大量移民涌入，但高度的工业化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城市居住条件的恶化。1975年开始，伴随着制造业的危机，毕尔巴鄂遭遇了高达25%的失业率，70000居民远走他乡，城市进入了衰落时期。进入1980年代，城市的主管机构开始尝试调整经济结构，企图从重工业转向服务、电讯业、旅游产业，将毕尔巴鄂打造成未来商务中心，由于天灾（1983年的一场洪水其旧城区严重摧毁）和人祸（1990年代初恐怖主义的猖獗），这一计划并未能实现，这座后工业城市失去了它昔日的活力，整个城市的命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18]。在这样的背景下，古根海姆基金会向毕尔巴鄂伸出了橄榄枝，纽约所罗门古根汉姆艺术博物馆决定将其分馆设立在毕尔巴鄂，这与当地政府的以文化产业复兴城市的计划一拍即合，历时6年建造，1997年，由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

里 (Frank O. Gehry) 主持设计新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在之后的一年里, 这座“如盛开的郁金香一般”的建筑物吸引了约 136 万游客, 超过整个城市的人口, 至 2000 年, 博物馆三年中带来的游客已经达到 400 多万人次, 经济收入达 4.55 亿美元; 1997 年以来创造了 126723 个工作机会, 是整个 1980 年代的十倍; 第三产业比重在产业当中比例明显提高, 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 政府税收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大幅度增长, 超过 40 亿欧元 (2006 年), 是 1990 年代中期的两倍。

毕尔巴鄂的复兴, 表面上看是由古根海姆博物馆这座现代建筑带来的, 背后的力量其实来自文化产业, 文化建筑只有和长期性的文化活动结合起来, 才能对城市的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毕尔巴鄂要想成为真正的创意之都, 必须培育和发展长期的、有影响力的城市节事活动与其物质环境相配套。

3.3.3 洛阳牡丹花会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 是中国著名古都,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 四千余年建城史, 自夏朝开始有 13 个王朝在此定都,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有着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洛阳牡丹花会始于 1983 年, 如今已经成功举办 30 届, 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本土节事活动之一。1982 年, 牡丹被定为洛阳市市花,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每年的 4 月 15 日到 4 月 25 日举办洛阳牡丹花会, 洛阳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改造建设四个园区、十个庭院、三条道路供节事使用, 1983 年, 第一届洛阳牡丹花会顺利开幕, 盛况空前, 展示了二十多万株牡丹, 接待了来自各地的游客 250 万人次。至此, 每年的牡丹花会节都吸引来数百万的中外游客。2011 年, 洛阳牡丹花会升级为国家级节会, 改名为“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2012 年 4 月 5 日到 5 月 5 日, 第 30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在洛阳举办, 还在上海和北京分别设立了分会场。在洛阳有洛阳国家牡丹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中国国花园、西苑公园等分布在城市各处的十座主要园区作为活动场所, 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965 万人次。经过 30 多年的经营, 洛阳牡丹花会已经从举办初期单纯的文化娱乐节会逐步发展成为融赏花观灯、旅游观光、经济贸易、对外交流和文化体育活动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经济文化盛会, 深刻影响了洛阳的文化产业, 成为洛阳最重要的节事活动 (图 7、图 8)。

洛阳牡丹花会的成功, 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 自古洛阳人就对牡丹情有独钟, 种植观赏牡丹的传统源远流长, 武则天贬牡丹至洛阳的故事也早已深入人心。1983 年的第一届洛阳牡丹花会的顺利召开就是一个因势利导的结果, 因为拥有足够的基础, 才会在那样一个宣传



图 7 洛阳牡丹已经成为城市品牌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白马寺附近的神州牡丹园



图 8 洛阳牡丹已经成为城市品牌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洛阳中国国花园

力度不大、对文化产业普遍不重视的年代获得那样大的成功。30 多年的牡丹花会的举办历史, 使得洛阳在 1980、1990 年代全国大搞工业开发的年代, 同时重视了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 为洛阳的城市转型打下了良好基础。

3.3.4 都江堰放水节

都江堰市位于四川省中部成都平原西北边沿, 地处岷江上游和中游结合部的岷江出山口, 因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得名。公元前 256 年李冰治理岷江, 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 彻底根治了岷江水患, 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都江堰清明放水节”是一项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民间习俗, 它源自都江堰的“岁修”制度, 为了保证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历久不衰, 自汉代以来, 每到冬天枯水季节, 在渠首用特有的“杩槎截流法”筑成临时围堰, 修外江时拦水入内江, 修内江时拦水入外江, 清明节内江灌区需水春灌, 便在渠道举行隆重又热闹的仪式, 拆除拦河杩槎, 放水入灌渠, 这个仪式就叫“开水”。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公元 978 年) 正式由官方将清明节这一天定为“放水节”,

并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既“祀水”又“祀李冰”，既乞求天佑丰年又彰显当朝盛世^[17]。此后，放水节逐渐成为川西民众最隆重的节日，一年一度，世代相传，其盛况尤胜春节。1950年的清明节举行了建国后的首次“放水节”。1957年之后，都江堰岁修措施改进，修建了电动钢制闸门，可以随时启闭，以往的“放水仪式”也就不再举行。1990年在都江堰市政府决议下，恢复了这项延续千年的传统节事。如今新的放水节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除了传统的祭祀仪式、砍杓槎放水大典外，还有一系统的民俗文化活动、清明商贸、投促、惠民活动等，已经成为都江堰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节事活动之一。

都江堰放水节的独特性在于它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获得广泛的公众参与，摆脱了中国节事活动常见的“官方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每年的祭祀大典的演员都是从都江堰灌区招募的本地居民，砍杓槎的刀斧手也是真正的经验丰富的岷江船工，广泛的群众参与让今天的都江堰人记住了自己的传统，延续着对水、对祖先、对自然的崇敬，而这些正是当前中国城市居民中最缺乏的。1990年开始恢复放水节也是都江堰市走出工业和经济挂帅的一个标志。都江堰放水节虽然是一个地方性的节事活动，其影响力远不如奥运会、世博会这些国际性的节事活动，但这类地方性节事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这类城市得以摆脱“千城一貌”困境的主要手段；这类蕴涵丰厚传统文化和地方精神的节事活动其实更值得学者们发掘和研究。

3.3.5 小结

从上面的几个案例不难看出，节事活动作为一股有效的动力，确实能够在促进工业型城市向人居型、现代服务业、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对于慕尼黑、毕尔巴鄂这些后工业时代的城市而言，节事成为了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因为大型节事筹办兴建的一大批博物馆、体育馆、画廊、音乐厅、会议中心、公共绿地等城市基础设施，成为了城市新的文化媒体；加上为了增加这些设施的可达性而完善的城市交通系统；以及网络时代媒体强大的城市营销策略，这些地区重新吸引关注，获得人气。不过，光有这些文化器官还不够，真正使这些文化器官运行起来的是有吸引力的节事活动。慕尼黑相对毕尔巴鄂更加具有竞争力，就在于它有一些列深入人心、影响极大的节事活动，来使那些城市的文化器官健康运行。节事活动不是一种常态，也没有必要成为常态，它真正的价值在于：通过节事活动，使得文化艺术体育娱乐活动深入人心，在节事结束后，城市的居民将对这些活动的热爱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也不忘记去到博物馆、体育馆、画廊、音乐厅、公园绿地中享受丰富多彩的城市生

活，让休闲成为市民的生活态度。

对于中国而言，在讨论城市节事活动时，我们不能笼统地用一个发展中国家来概括，更不能简单地提倡所有城市都大搞节事活动。须知由于中国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差异很大，城市化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和方式相差显著：中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出现了后工业时代城市的特征，有不少城市拥有朝着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潜力，更有一大批工业化不久的中小城镇，以及一大批本不适合走工业化道路却硬往这条路上奔的城市。与工业化一样，中国城市对于节事活动的态度也是一拥而上，不顾自身资源禀赋，盲目地跟风造节，仅2009年一年，全国各地举办的（能在网上查到的）各类节庆活动就有965个^[20]，其中高品质的节事活动并不多，案例分析中的洛阳牡丹花卉节算是其中的佼佼者，30届长盛不衰的举办历史证明着它的魅力，只有拥有城市物质和文化基础的节事才能有这样的生命力。中国的城市，应当务实地为自身发展定位，清醒地认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在适宜的时机，适宜的地点利用城市节事这种新的城市动力。节事活动的发生是因势利导的结果（都江堰放水节就是很好的一例），而非强行制造产生的，只有将节事规划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才能利用好这种新的动力，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4 节事活动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相互响应

4.1 重新明确节事活动的综合价值，突破唯商业论

中国的节事活动，多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背景下举办的，节事被异化为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其他方面的价值，得不到重视。本来地方政府利用节事活动发展城市经济的初衷无可厚非，但这种泛滥模式下造出来的节事活动，既没有文化内涵，也收不到预期的经济效益。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节事活动对于城市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能够为城市提供强大的磁场，吸引人群聚集，这种聚集不仅仅是节事期间的短暂聚集，而是节事效益扩散后，整座城市作为一个磁体，拥有持续吸引居民和到访者的力量。这就要求对节事活动根植于城市本土文化，发展地方性的节事活动（例如上文提到的都江堰放水节），即使是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国际性盛会，也需要本土化的融入，而非官方唱独角戏。让节事活动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让节事活动所凝聚的城市文化扩散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将节事活动视为一种城市文化手段，而非经济手段，才能突破唯商业论，实现节事活动的综合价值。

4.2 准确定位，因势利导

诚如前文强调的那样，目前并不是每座城市都适合大搞节事运动，不同的城市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务实地设置城市节事规划的目标，根据这一目标，冷静思考当前城市是否适合大力发展节事活动。利用节事活动进行城市转型，也是在需要转型时才可应用。前文提到的“盲目造节”的城市正是没有认识清楚一点。不过，这并不是说经济不发达城市就不适合搞节事活动，恰恰是那些传统文化保持较好，受全球化冲击较小的中小城镇中还存有更多的传统节事活动的因素，因势利导，鼓励此种节事活动的发展，才是节事规划的关键。所以说节事活动不是凭空规划出来的，而是重新发现传统，逐步恢复或者引导发展而来的。

4.3 鼓励培育自下而上的节事活动

从目前中国已有的节事活动来看，大多都是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开展的，不少节事活动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基础，市民只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的态度，很少主动参与到其中，光靠行政力量和商业力量支持的节事活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是一个地域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各个地区和不同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事活动，例如汉民族的祭天、祭祖、祭孔等祭祀活动；云南傣族的泼水节（图9）；广西壮族三月三民歌节；云南彝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的火把节；以及习见于民间的赶集、庙会等活动，这些节事活动多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民间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群众基础。不同类型的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培育发展此类节事活动。对于城市规划而言，需要为这些传统节事的现代化提供适应的交通和空间支持，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宣传和挖掘节事文化，促进市民参与。对于那些外来的国际性的大型节事活动，要广泛发动市

民参与，承办之初，征求市民建议；节事之中，鼓励市民作为经营者或志愿者参与活动；节事之后，向市民开放场馆、展区等物质空间，使其变为吸引市民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4.4 以节事活动催生城市文化器官

伴随着重大的节事活动，往往超前兴建大量博物馆、体育馆、画廊、音乐厅、会议中心、公共绿地等城市基础设施，场馆的会后利用是每座承办城市无法回避的话题，利用不当的，会造成巨大浪费，成为城市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一座城市，光有博物馆，没有人参观；光有音乐厅，没有多少人懂得欣赏；光有画廊，没有多少懂艺术的人；光有体育馆，没有多少热爱运动，使用体育馆的人……一切物质设施都会成为摆设，最终走向衰败。这些城市文化器官，需要有人活动来带动，才能健康运转起来。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设施建设水平应该与其需求相适应，但是，一定程度的超前建设，是可以促进城市文化的发育的。大型节事活动建设的场馆，在使用之后，需要一系列的市民活动使其继续运转，利用这些场馆，针对市民需要，规划一系列适宜的节事活动，有利于市民文化的培育，使这些城市文化器官真正运转起来，成为新的城市磁体。

4.5 推进节事活动与城市建设的相互响应

节事活动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需要与城市建设目标相适应。在城市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动力的重要性，将其纳入规划体系之中。一方面，节事活动可以作为某些新区与衰落区的活化剂，在物质空间建设完善后，增加空间活力；另一方面，城市建设需要在人们喜爱的聚集点，节事活动可能或者正在发生的地方（例如一些传统的集市、庙会区域），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其交通可达性，修复和新建一些必要公共设施，促进和培育节事活动的形成，扩大其影响力。



图9 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已经被舞台化，成为吸引游客的一种狂欢活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如今这个信息化如此发达的社会,利用智慧城市的建设机遇,自下而上复兴城市文化成为可能。试想当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城市信息网络,找到志同道合之人,个人和小团体发起的活动也能够得到来自城市各处的人群的响应,最终以丰富多样的人文景观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时候,城市文化可以呈现怎样一种活跃状态。

4.6 提升规划师业务水平,应对机遇与挑战

由于中国正处在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越来越多的城市都走到了发展的转折点上,许多城市需要重新为自身定位,寻找新的城市发展动力,推动多元的城市化模式。21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世纪,各种历史上出现过的、未出现的问题都在中国城市中上演,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如今的规划师们要对应这些机遇和挑战,就需要打破曾经的思维定势,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职业修养,拓宽视野,联系更广泛的相关学科,利用各种机遇应对中国城市转型,而节事规划的市场需求与运营管理,正是规划师们不曾碰见的机遇之一。

5 结语

面对中国城市转型这个重大课题,城市规划研究界和政府规划管理部门,需要认真对待城市节事的规划发展问题。城市节事作为转型时期的城市发展动力之一,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型城市向人居型、现代服务业、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转型。总结经验,利用好这股新鲜动力,对于中国的城市化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 [1] 戴光全,保继刚.西方事件及事件旅游研究的概念、内容、方法与启发(上)[J].旅游学刊,2003,18(5):26-24.
[2] 余青,吴必虎等.中国城市节事活动的开发与管理[J].地

理研究,2004,23(5):845-855.

- [3]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7.
[4] 金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5(4):5-14.
[5] 侯百镇.转型与城市发展[J].规划广角,2005,21(2):67-73.
[6] 张飞相,陈敬良.国外城市转型的趋势及经验借鉴[J].公共管理,2011(5):137-139.
[7]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的探索[J].规划师,2001,17(6):5-8.
[8] 顾朝林.城市化的国际研究[J].城市规划,2003,27(6):19-23.
[9] 仇保兴.紧凑度和多样性: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J].城市规划,2006(11):18-24.
[10] 于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53(5):470-477.
[11] 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387-398.
[12] 吴志强,干帆.世博会选址与城市空间发展[J].城市规划学刊,2005,158(4):10-15.
[13] 于海波,吴必虎,卿前龙.重大事件对旅游目的地影响研究——以奥运会对北京的影响为例[J].中国园林,2008(11):22-25.
[14] 曹晓昕.大事件与城市未来发展的思索[J].城市建筑,2010(2):7.
[15] 彭涛.大型节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J].规划师,2006,178(6):5-8.
[16] 吴唯佳.德国慕尼黑的城市建设[J].国外城市规划,1995(4):37-44.
[17] 郑曦,孙晓春.解析“城市事件”作为城市发展与环境景观建设的助推力:以德国城市慕尼黑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07(5):91-96.
[18] 王丽君.文化建筑:城市复兴的引擎[J].华中建筑,2007,25(6):12-14.
[19] 玫影.都江堰放水节[J].西南航空,2006,106(11):86-87.
[20] 王春雷,梁圣蓉.2009中国节庆产业发展年度报告[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